

吕氏春秋先秦史料考订编年

许富宏 著

 凤凰出版社

吕氏春秋先秦史料考订编年

许富宏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先秦史料考订编年 / 许富宏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506-2583-9

I. ①吕… II. ①许… III. ①中国历史—编年史—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9016号

- | | |
|---------|---|
| 书 名 | 吕氏春秋先秦史料考订编年 |
| 著 者 | 许富宏 |
| 责 任 编 辑 | 韩凤冉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1.75 |
| 字 数 | 262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583-9 |
| 定 价 | 5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1-8787113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2YJC770062)

本书获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精品著作工程出版资助

前 言

傅斯年指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①因此，从事历史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做史料的工作。在先秦史的研究中，由于历史久远，史料散佚，如何寻找史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涌现出来，提供了新的史料，迎来了先秦史研究，尤其是先秦思想史研究新的热潮。在考古工作方面，也有诸多文物出土，给先秦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实物资料。这种局面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寻找史料的工作不能仅仅依赖地下文献与文物，还要寻找新的途径。在周秦汉时期的诸子著作中，保存有不少先秦史料。只是过去人们往往囿于历史是科学，而先秦诸子著作更多是想象与虚构的文艺作品，从而忽视了对先秦诸子著作中史料的发现与挖掘。先秦时期的典籍，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征，其中具有史学的特征，更具体地说，其中含有史料。但是至今学术界仍然缺乏对其中的史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当然，先秦诸子中的史料保存情况也不尽相同，这里以《吕氏春秋》为例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 页。

来做一番史料的清理工作,以便为正确对待先秦诸子中的史料问题作些探索。

—

《吕氏春秋》除“十二纪”纪首外,其他各篇中一般都有几则历史小故事用作说理的例证。这些历史小故事一般都有与叙事相关的几个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对话,自具首尾,单独成章^①。同一篇中往往由好几则这样的历史短章,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并没有联系,只是共同用来说明一个主题。这里列举《制乐》篇为例:

四曰: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今室闭户牖,动天地,一室也。故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

① 章是先秦文献的最小组成单元。

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制乐》篇主旨是“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在中心论点之后，列举了“成汤有谷生于庭”、“文王地动”、“宋景公时荧惑在心”三则历史小故事作例证，证明主旨。三则历史小故事时间分别为成汤、周文王、宋景公，时间跨度很大，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从文章的角度看，三则历史小故事只是说理的例证。但是，如从历史角度看，它们同时也是三则宝贵的历史史料。第一则是反映了商汤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第二则反映周时地震的情况，第三则是春秋时期人们对天象的认识，都将自然异象、地理异象、天文

现象与国君之德比附起来。既是研究当时人们对自然、天文现象认识的资料,也是研究商汤、周文王、宋景公思想的重要史料。

上述所举三则历史短章彼此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而《吕氏春秋》中还有一些论乐的篇章,其中的小故事有共同的主题,而又前后承接,总体来看,则是一部小的音乐发展史了。如《古乐》篇,其曰:

五曰: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简,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鬴先为乐倡,鬴乃偃寝,以其

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帝啻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鞀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鞀椎钟，帝啻乃令人拊，或鼓鞀，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啻大喜，乃以康帝德。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鹿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涿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箬》九成，以昭其功。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

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

这里列举了从远古朱襄氏至周成王时作乐的情况，是古乐发展的

简史,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史料。所以,《吕氏春秋》中蕴含的先秦史料是不可忽视的。对《吕氏春秋》中的先秦史料,学术界很早就有人认识到,如白寿彝先生即说:“(《吕氏春秋》)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①又如徐复观先生说:“《吕氏春秋》,应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作重新发现性的研究。例如其中包含大量的古代史料,便值得与同一史料,但分见于先后或同时的各种典籍的,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②冯友兰先生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说:“惟其书成于众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然此书不名‘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史记》谓吕不韦以其书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亦以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以《吕氏春秋》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是史公亦以此书为史也。以此书为史,则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只言片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

二

《吕氏春秋》为什么可以视作史学著作呢?这与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意图密切相关。综合起来看,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是仿效孔子作《春秋》。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早在西汉初年,司马迁即指出吕不韦仿效孔子作《春秋》而作《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司马迁把吕不韦作《吕氏春秋》与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左氏春秋》、铎椒作《铎氏微》、虞卿作《虞氏春秋》并提对待。《铎氏微》与《虞氏春秋》今均不见，《春秋》与《左氏春秋》，今皆可见，二者皆以记录历史为主，为史书。虽然《春秋》有所谓的“大义”，后世列为经书，但其“义”也是依托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与排比之中。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也是“集六国时事”。在司马迁看来，《吕氏春秋》与《春秋》、《左传》一样，都是史书。所以，《吕氏春秋》的編集是仿孔子修《春秋》的做法的。

对《吕氏春秋》与《春秋》的关系，前人已经有所认识。清代的学者章学诚就主张《吕氏春秋》属于“春秋家”，提出了《吕氏春秋》的学派性质是“春秋家”说。他在《校讎通义》中指出：

《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当互见于《春秋》、《尚书》，而猥次于杂家，亦错误也。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

总名。然而《左氏》而外，铎椒、虞卿、吕不韦之书，虽非依经为文，而宗仰获麟之意，观司马迁叙《十二诸侯年表》而后晓然也。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刘知几讥其本非史书而冒称“春秋”，失其旨矣。

在章学诚看来，因为古代的“春秋家”体例没有一定的规范，总起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儒家的“经”，如《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另一种是历史书，如《左氏春秋》、铎椒、虞卿、吕不韦之书。《吕氏春秋》中有“十二纪”，其中“四时错举”，因而名曰“春秋”，也没有不合适。章学诚这里的意思是说，过去人们一说《春秋》，就将其体例定为“经”，但实际上过去的《春秋》并不一定就是指儒家的“经”，《春秋》还可以指“史”。“刘知幾讥其本非史而冒称‘春秋’”，说明章学诚认为《吕氏春秋》是“史”书。他还说司马迁写《史记》，学的是《吕氏春秋》，而《史记》是史书，所以可以看出章学诚是把《吕氏春秋》当作“史”来看待的。

其次，《吕氏春秋》的著述目的同于《春秋》。孔子修《春秋》，其目的是“以制义法”，使“王道备”，也就是俗说的“素王”。吕不韦编《吕氏春秋》的意图也是如此。《春秋》原为鲁国的史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之言，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拨乱世反之正”。又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的目的就是“以达王事”，其实质就是“治”。孔子制《春秋》，目的是治理国家。“《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上引孔子论六艺也包括《春秋》，这与《吕氏春秋》事关于“治”的学说是高度相合的。具体来说，《吕氏春秋》具有“拨乱世反之正”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吕氏春秋》倡导治世，其书是关于治道的论述。自春秋以来，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到了战国中后期，仍是如此。吕不韦生活的时代一直是诸侯战争不断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乱世。这样的乱世在国家的治理上也是各不相同。秦即将统一了，如何在统一后治理好秦国，吕不韦集中了一批门客开始集中探讨。因此，吕不韦是拨战国乱世反之治世。这在《吕氏春秋》中《执一》、《贵公》、《去私》、《振乱》等篇中看得出来。第二，《吕氏春秋》倡导儒家的王道德政反对法家的霸道暴政。就吕不韦所在的秦国来说，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这一点吕不韦是反对的。秦始皇沿用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贯的治国之策。吕不韦反对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倡导用儒家的德政思想治理国家。《吕氏春秋》也有拨法家返回儒家的意思。这在十二纪中表现最为突出。《十二纪》六十篇，核心思想是论人。从人的生到人的死，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如《重己》、《贵生》、《尽数》、《先己》等篇的重视人的生命

价值和养生尽寿等思想就是对秦重视利益的争夺而轻视人的生命等观念的纠正。《当染》、《劝学》、《尊师》、《功名》、《诬徒》等篇重视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熏陶对人的影响,是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也是对秦以利驱人、以法慑人思想的纠正。《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七篇关于论乐的文字,则关注对人心灵的熏陶和精神生活的满足。《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等篇论兵,倡导义兵,反对乱杀无辜,既与珍惜人的生命有关,也是对秦用兵残酷,不是兴义兵的纠正。而《节丧》、《安死》、《异宝》、《异用》等篇,是宣扬人死后要节约安葬的,这明显是对秦始皇厚葬思想的纠正。从十二纪各篇来看,主要是倡导要珍惜人的生命,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这一点与儒家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儒家更侧重人的伦理道德,《吕氏春秋》则更重视人本身的个体生命价值。从“治”这个角度看,《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与《春秋》是相通的。

再次,《吕氏春秋》处理材料的撰作方法同于《春秋》。“春秋”原为春秋时期各国史书之通名,是孔子根据鲁国的旧史进行了改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这里说的很清楚,孔子对鲁国旧史进行了改造。有学者研究,孔子主要做了裁断、笔削、改造的工作^①。衡之《吕氏春秋》,也是采用《春秋》的做法。第一,裁断。据赵生群先生的研究,裁断主要是指断代。鲁史自周公、伯禽开始至隐公已有十四位君主,如果自周公至哀公共有二十五位君主。可是为什么要从隐公开始到哀公结束呢?这里面有一个裁断。孔子以隐公开始目的是宣扬自己的“以礼让治国”。“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

① 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5 页。

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①赵先生所说的裁断主要是说孔子的政治倾向是主张禅让。巧合的是孔子的裁断标准也正是《吕氏春秋》的裁断标准。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表达的君主更替的政治理想就是禅让。《吕氏春秋·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不是一家之私产。那么,如何实现天下人来管天下呢?就是禅让。《去私》篇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行论》篇中说“尧以天下让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是至公的表现。只有实行禅让,天下人共推贤者为君,才能实现天下是天下人的理想。《贵生》篇言“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离俗》篇又说舜让石户之农、北人无择,汤让卞随、务光等,都是吕不韦所向往的。禅让是《吕氏春秋》所设计的君道的重要内容,是君主更替的理想方式。而君道又是《吕氏春秋》“治道”的龙头,因此禅让是吕不韦及其门客裁断的标尺,《吕氏春秋》全书也是按照这个理想来设计布局的。这一点与孔子修《春秋》是相通的。第二,笔削。根据赵生群先生的说法,笔削主要是对材料的加工。皮锡瑞说:“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廖廖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经学通论四·春秋》)庄存与也说:“《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春秋要旨》)这都是说孔子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史料进行了加工。这一点在《吕氏春秋》

① 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第9—10页。

中表现更为明显。《吕氏春秋》的材料来源是先秦时期历史,或来自官方,或来自民间口传。从《吕氏春秋》各篇来看,加工的痕迹也很明显。各篇所论均有一个中心,论点往往先阐述,例证一般在后;也有例证在前,观点在后的;也有夹叙夹议的。因篇目繁多不一一例举。但是,《吕氏春秋》是对先秦史实以及诸子各家的思想资料进行笔削工作是不难看出的。

最后,《吕氏春秋》取名也表明其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代国家大事,主要集中在春季和秋季。春季有播种,秋季有收割。后来以“春秋”二字来指代一年四季的政事。后又把记载一年四季中政事的书,称为《春秋》。《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认为,《春秋》是史书。吕不韦给书起名“吕氏春秋”中的“春秋”也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纪,“十二纪”意思就是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事之记。虽然吕不韦及其门客把政事平均分摊在春、夏、秋、冬四季之中,但由于季节和气候的关系,实际上还是春季和秋季的政事更加重要。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所以“吕氏春秋”中“春秋”还是秉承政事之治的传统而来。孔子修《春秋》,“把‘微言大义’寄托在《春秋》之中,借《春秋》的历史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正是孔子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自序》引)^①。由此可见,孔子编《春秋》的目的是借事发挥,重在“其义”,而“其文”、“其事”则是次要的。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就是模仿或继承了孔子的这一做法。《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篇云:“古之有天下者,七十一圣。

① 钟肇鹏:《求是斋丛稿》上,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560页。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这是吕不韦模仿孔子的最好说明。罗峻《诸子学述》：“兹但就子、史二家相通之义，约略言之。《汉志·六略》无史类。凡《国语》、《战国策》、《秦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诸书，皆列入六艺春秋家。春秋者，史之别名也。……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据史迁之说，则儒家（《孟子》、《孙卿子》、《公孙固》、《虞氏春秋》）、法家（《韩非子》）、杂家（《吕氏春秋》）、阴阳家（《汉志·张苍》十六篇），皆采春秋、六国时事，著为成书。”^①又曰：“子书之称述故事，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纪本末。故子书所记春秋、战国时事，间与《左传》、《国策》有不合者。”^②所论甚是。

三

《吕氏春秋》中的先秦史料虽然有一些已经或部分被作为史料而使用，但是由于《吕氏春秋》属于子书的性质，对《吕氏春秋》中的先秦史料的重视与使用还远远不够，其价值也未获得全面的认可。因此，有必要对《吕氏春秋》中的先秦史料的性质作一番说明。

《吕氏春秋》继承《春秋》重“事”的传统，以“事”明“义”。《春秋》

① 罗峻：《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5 页。

② 罗峻：《诸子学述》，第 96 页。